

高研院通讯

IAS News Letter

(2020 年 · 秋季号)

【高研院要闻】

驻院学者孵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工作取得成果

我院自 2018 年以来围绕“驻院学者冲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申报”这一中心工作，先后采取多种办法为驻院学者开展重大项目选题的提议、论证、讨论和文本修改等工作，本学期取得了重大进展。2020 年 4 月 14 日，商学院教授、高研院第十一、十四期驻院学者韩剑教授申报的《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与治理规则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批准立项；7 月 6 日，艺术学院教授、高研院第八、十四、十五期驻院学者周计武申报的《艺术学理论的跨媒介建构及其知识学研究》艺术学重大项目获得立项；此外，我院还有 2019 年已经获得重大项目立项的文学院卞东波教授在院从事《东亚古代汉文学史》的研究工作。

我院与国际知名学者联络授课事宜

2020 年上半年，由于目前疫情的影响，在我院从事学术研究、本科生指导和开设短期课程的国际知名学者勒克莱齐奥教授、贝尔纳·斯蒂格勒教授、大卫·哈维教授、斯科特·拉什教授等人本学期无法来校授课，在这种情况下，我院与他们及相关院系积极保持联系，商议安排延后授课的相关事宜。这些外国学者也对中国的抗疫工作表示高度的关注和支持，勒克莱齐奥教授还在今年 3 月给我校驻院本科生来信，对中国的抗疫工作表示支持和鼓励。我院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宣传。

高研院与理工科院系策划跨学科课程

在 2019 年 5 月邀请我校理、工、医、文、艺等不同院系的知名学者 12 人成功举办了我校首届“科学与人文对话”系列讲座之后，我院本学期又在积极联系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向东、张辰宇等知名教授策划以“起源”、“生命形态”等为主题的第二期“科学与人文”的跨学科对话活动，期望在正常教学秩序恢复以后的合适时间里向我校师生推出。

高研院举办线上学术讲座

本学期在学生无法返校正常上课的情况下，高研院通过组织在线讲座等方式，邀请驻院学者刘成教授、胡翼青教授、周计武教授和鲁安东教授举办了四次学术讲座，邀请驻院本科生导师何成洲教授、吴福象教授给驻院本科生做专题学术讲座。每次讲座高研院网页和微信公众号都进行了宣传报道，丰富了同学们在特殊时期的学术生活。

高研院跨学科团队继续举行学术活动

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高研院的莎士比亚（中国）中心、数字人文中心、中-加城市中心、医疗社会史中心、和平学研究中心等跨学科研究小组继续保持活动，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数字人为中心举办了 4 场“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设计理论”专题讲座；城市中心

的鲁安东教授发起主持了多场建筑批评与建筑理论方面的论坛，医疗社会史中心的闵凡祥教授参加并主办了“疫情与社会”的系列专题讲座，特别是莎士比亚（中国）中心，除了进一步与“友邻优课”强化了学术合作联系并争取到了新的资源之外，还进一步优化了原定于今年5月举办的“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活动流程，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工作的发展。

高研院驻院本科生活动继续推进

本学期在本科生未能到校上课的情况下，高研院的各位驻院本科生导师们仍然坚持给他们指导的各位同学开展读书会、座谈、讲座等新式的教学活动。高研院也通过在线活动的方式，给驻院本科生举办学术讲座和暑期班。高研院在今年6月毕业季到来之前，还联合教务处一起给第四期驻院本科生发送了结项证书。

驻院学者周计武教授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获得立项

2020年7月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公布的信息，在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申报中，我校艺术学院教授、高研院第八、十四、十五期驻院学者周计武教授申报的《艺术学理论的跨媒介建构及其知识学研究》艺术学重大项目获批准立项，这是继2019年高研院驻院学者、文学院卞东波教授获得《东亚古代汉文学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2020年4月驻院学者、商学院韩剑教授获得《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与治理规则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以来，高研院开展跨学科学研究和成果孵化的又一阶段性成果。

我院本学期的编辑出版工作

本学期高研院继续进行高研院学术成果的整理和出版工作，目前我院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高研院学者文丛》（上下册）60万字，已经进入三审程序，不久即可问世。高研院第七期《院刊》30万字已经收集组稿完成，即将交付商务印书馆进入编辑程序。高研院莎士比亚中心的《当代莎士比亚评论》近期也将出版。高研院在本学期也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推送相关活动信息多篇。

【名家讲坛】

《华山图》与现象学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彭锋

2020年11月12日晚，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彭锋教授应邀做客南京大学高研院名家讲坛，为南大师生和校外听众带来了一场主题为《华山图与现象学》的精彩演讲。本次讲座由高研院驻院学者、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周计武教授主持，艺术学院赵奎英教授、李牧副教授、东南大学沈亚丹教授等学者也一同聆听了讲座并参与了讨论。

在讲座开始时，彭锋老师首先介绍了中国美学与现象学之间的关联。他向大家推荐了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牧老师翻译的英国学者保罗·克劳瑟所著的《视觉艺术的现象学》一书。他认为，现象学在进行艺术鉴赏尤其是鉴赏传统艺术现象时，比其他的美学和艺术理论流派更有优势。在今天，现象学和中国传统艺术案例的契合度很强，说明艺术和审美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关系，这对于目前的美术史研究有很好的启发性。

彭老师指出，现象学的目标是让事物在我们的经验里如其所是地显现，这一目标看似简单，但其实实现起来有些难度。中国古代哲学，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特别是禅宗，都特别想要回到事物本身。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但往往越想回到事物本身，就离事物本身越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目标虽然单纯，但并不那么容易实现。他引用了倪梁康的观点来说明，作为一种哲学的现象学其实是与实践之间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张力的。冯友兰对于正底和负底两种方法的区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诗”这种表达方式的特殊之处，即诗并不讲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也不讲它不是什么，但是诗是让形而上学的对象直接在场、直接呈现。现象学的思维方式也同样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很多案例中，比如在王夫之看来，诗是一种“现量”，诗所呈现的是一种现在的、这里的经验。也就是说，在王夫之看来，诗刚好能够实现现象学的目标。

彭老师认为，现象学对于艺术研究的最大贡献也就是研究如何从那里的经验抽身回到现在的、这里的经验，也就是现象学还原的问题。他说，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John Cogan 的解释，有这么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中，我们遭遇到世界的时候，我们没有知识、没有先入之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了知识、有了先入之见，经验就不是纯粹的经验，而是污染了的经验。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让我们遭遇到没有受到知识和已有成见污染的世界呢？就是震撼、吓你一跳，这时候脑子里所有的知识和先入之见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棒喝一下，回到本然的经验，遭遇到没有被污染的世界。在这里面，有两种经验是完全对立的。震惊的经验会使我们遭遇到没有被污染的世界；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头脑被知识所武装。在与世界打交道之前，我们都没有放空，在经历震惊后就会放空。当对这两种经验进行对照后，会发现我们日常经验对事物的理解特别苍白，只是人云亦云而已。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很震撼，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事物本身，看见了崭新的东西，或者说，看见了熟悉事物的新面貌。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彭老师针对王履和他的《华山图》展开的细微的文本分析和现象学解读，在他看来，这是研究中国现象学美学的最佳案例。在这里，他主要从王履文字的错讹与中国现象学美学的遗憾这一视角切入。王履在绘画领域之所以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主要是

因为他不是画家，而是看病的大夫。作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他也有医书流传至今。他在《明史》中被放在“方伎”中，而没有被放进“文苑”里。王鏊在《震泽集》中认为，是因为大家最早读到的是他的医书而不是他的画，对他的认识仅限于很有名的医生，而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和画家。而且，当我们在用现象学对中国美学进行研究的时候，也会忽视王履，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正确的“华山图”。目前流行的版本是《中国画论类编》中选的，名为“华山图序”，最关键的地方是“苟非识华山之我余，我其能图耶？”，而它的原文则是“苟非华山之我余，余其我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句子。彭老师发现，今天通行的《华山图序》是错的，其真正的意思被埋没了。而更重要的问题则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讹？究竟谁弄错了？在什么时候弄错的？为什么会弄错？

通过对《重为华山图序》的几个版本进行梳理，彭老师让我们得以更清晰地推演出误传的过程。目前，《重为华山图序》有五个版本，第一个是手书本，第二个来自《铁网珊瑚》，第三个来自卞永誉编撰的《式古堂书画汇考》，第四个版本来自《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第五个版本来自俞剑华编撰的《中国画论类编》，也就是畸翁本。通过对这些版本进行校对，可以发现13处不同，大部分不同可以忽略不计，但有些地方的错讹则非常明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具体原因目前尚不能得知，但可能的原因有：其一，书中的“苟非华山之我余，余其我邪（耶）”与“苟非识华山之形，我其能图邪”等句之既不好读，也让任读不懂；其二，读懂了，但这对于清代的历史形态来说是不太友好的，也就是，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我，就好像平时不是真我一样，这对于封建思想来说是不太好的。

而王履不但在其所生活的时代没有名气，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被现代美术史发现，以至于到六七十年代才为人所知，其中还充斥着各种错误。据此，彭老师认为，现代美术史发现了表面的王履，但也遮蔽了深刻的王履。现代美术史家之所以重视只有一本册页传世的王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关于形与意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尤其是对“形”的强调。王履在《重为华山图序》结尾处得出的结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与西方绘画的步骤基本一致。西方美术史家重视王履，多半也是看重他写实的态度和精神。然而，现代美术史的作者都只看到篡改过的《华山图序》，加上过于看重形与意的关系的论述，忽视了涉及“真我”与“真物”的更重要的论述。而王履之所以更受西方人的重视，是因为王履笔下的华山，是在眼睛看的之前还存在客观存在的华山，这种客观存在的华山和我们眼睛看到的华山是有区别的。这一点在20世纪已经在西方文化中辨析得很清楚了，因为眼睛看到的华山会受到先入之见等等的污染，我们不能在这里遭遇到真正的华山，但是，眼中之物前的华山可能是纯客观的华山、现象学意义上的华山。王履表达出了这层意思。

以此为基础，彭老师进入讲座的第三部分，也是尝试探索《华山图》背后的中国美学与艺术中的现象学脉络。他认为，俞剑华、高居翰等人对王履的误解，有可能源于他们没有攀登过华山。那么，王履在爬华山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当时的王履50多岁了，听说有人在华山上修道，因此想上去看看。对于需要采药的医生来说，爬山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华山是非常特别的山，他一上去就下不来了，非常后悔。很多记载说他吓得不敢动，大惊大恐。这种震撼的经验来自于大自然对王履的震撼。在此之前，王履一直生活在别人的经验中，在经过这个震撼后，他回到了真我。因此，俞剑华说王履没有跳脱出过去画家的习气，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甚至他可能没有认真读完王履的册页。王履都是在被震撼后作画并写下题记，因此它们非常真实。

王履在爬华山的时候不仅意识到了真我，还看见了真物。我认为这是伟大的现象学的表达。在《重为华山图序》中，他写道，山作为山，没有一座山是一样的。而山的概念是一样的，当我们用山的概念去描述所有的山时，就取消了所有山之间的区别，这是有问题的。这么多山在王履看来，有常态的山，有变化的山，关键的还有“此岂非变之变焉者乎？”这意

味着，没有一个事物能被概念套牢。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命名的，抵制任何概念对它的理解的。这种事物完全地显现了事物本身。王履对真物、真我的认识和发现是合拍的：只有发现真物，才能意识到真我；只有遭遇真我，才能意识到真物。接下来他写道，自然是这么变化万千，我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吗？因此，我要抛弃过去的自我，遭遇新的事物，拥有新的自我。这是非常精彩的段落。因此，王履的“苟非华山之我余，余其我耶”如果放在现象学的背景里看，是特别了不起的一句宣言。他比石涛说得精彩很多，可能因为王履是科学家，所以他的表述要清晰、简洁很多。

彭老师指出，在中国古典美学里一再强调要真，哪怕是真缺陷都比假完美要强。袁宏道评价他的弟弟袁中道，好的地方就不说了，即使不好的地方也是“本色独造语”，但最让人喜欢的往往也是写得不好的地方，好的都有“粉饰蹈袭”，不好的才是最好的，因为不好的是真的，是真情流露，而一旦变得完美，就有可能是经过修饰的。当然，有人为了让别人感到缺陷而有意留下瑕疵之处，这不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是不行的。由此也就引出了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美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庄子美丑不分，但是他并不是真的不知道美。从东施效颦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庄子是知道美丑的。但是，作为丑人、作为东施，有没有救、有没有机会变美呢？机会是有的，但不是模仿东施。在阳子之宋的故事中，“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美的人自美和丑的人自丑，区别在哪儿？“美者自美”，这里的“自”应该是追求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美了会追求更美，但是当他追求更美的时候，就偏离了自己的本性，慢慢就不美了。“恶者自恶”，这里的“自”应该是正视的意思，一个丑人正视自己的丑，连丑都不怕了，不会做任何掩饰，完全可以彰显自己的天性，才有机会变成大美。有了这样的对比，可以看出庄子的美是一种自然的大美，即使美的风格不一样，它们的境界也是一样的。

因此，彭老师认为，美不是追求，而是正视。只有正视现状，才能停留在现在这里，不至于被过去、那里、未来所牵扯。如何在现在、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现象学还原中所说的震惊，在被吓了一跳的时候，就会回到现在这里，就会有王履说的那种“久客还家”之感。所以，他认为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表达和追求的就是一种在受到震惊后回归的真实经验，哪怕它是丑的、有瑕疵的。在讲座结束后的讨论阶段，与会听众与彭老师就王履作画时的心理状态与《华山图》的意义、现象学与理解的关系、现象学的主要局限和困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大变局背景下外国文学研究的创新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刘建军

2020年11月17日晚，高研院邀请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刘建军教授做客名家讲坛，在线为我校师生做了一场主题为“大变局背景下外国文学研究的创新问题”的学术演讲。本次活动由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何成洲主持，来自我校和校外的200多名老师同学聆听了讲座并参与了讨论。

本次讲座主要围绕“大变局对当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挑战”和“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创新思路”两个方面展开。刘老师指出，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当今科学

技术，比如人工智能、量子力学的发展，对我们现在的人的主体地位发出了挑战，但仍然有很多人还是在原有的背景下、原有的思维模式下来思考文学问题。对于这一点，刘老师认为，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是根据对象来确立的。最早人面对自然的时候，人的主体性是对自然而而言的。在古希腊神话时代，在原始社会中，人和自然的矛盾是最大的矛盾，所以那时候人的主体性是在和自然的对峙和斗争中体现出来的。到了中世纪，神学的发展使得“神”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力量，这就来到了人的主体性的第二个阶段，即人在神的面前体现自己的主体性。到了十八、十九世纪，特别是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发展到了以物为中心的主体性，在物的面前体现主体性。而到了二十世纪以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之前，物成了一个物化意识，也就是主体性的第三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中，人创造的东西成了自己的主人，人被自己创造的物所奴役和支配，也就是人被异化了。反异化就是说人如何靠自己的能力，在物的物化意识前显示人的主体性。回到文学研究上，过去主要是批评资本主义制度，显示出人在制度面前的自主性；我们批判反动的宗教束缚，体现人在宗教面前的自主性。但现在不知道对象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坚持主体性？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次，大变局带来的挑战是思维方式的挑战。刘老师在这里详细分析了“量子力学”的案例。他认为，量子力学不仅是一个最新的科技领域，而且它还取代了牛顿所创立的传统力学的思维方式。我们过去思考问题是，一个原因发展导致了一个结果，也就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用综合思维把这些组合在一起，然后保持事件的有序性。牛顿力学的理论及其指导的实践便是如此。而量子力学强调的则是粒波或者波粒，也就是说，粒子的行为常常像波，就像一个乒乓球打过去以后，通过惯性落在了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第三个点、第四个点。量子力学中的粒子就像打水漂一样，不仅是一个个的点，还形成了波。所以在这种理论中，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我们说的量子纠缠就是说一个东西不仅引出一个结果，它会在形成的波中与其他东西发生纠缠，波粒论就形成了“场域”的概念。他进而分析了《红楼梦》中傻大姐的角色与情节发展的关系，以及《老人与海》中倒数第二段老人的梦境和游客的对话中蕴含的意义。他认为，后现代文学的主张把定义的权力、自主表达的权力交给读者，意义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产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从过去一个原因一个结果的决定论变成了波粒场域的无限结果，也就等于文学作品有了巨大的发展。

刘老师指出的第三个挑战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在文学研究中，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带来的挑战。他认为，传统的自由主义讲究人的个性自由，强调人的个性解放，强调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能力，重视个人欲望的满足，并且它有一个基本性的规则，就是不能抛开真善美，不能抛开某种价值和道德的束缚，强调不能破坏人类发展的规律。所以说，传统的自由主义有一个基本的底线，一个社会性的理想规范。而新自由主义主张一切权威都要被打倒，任何束缚人的力量都要被摧毁，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个人的自由，任何束缚和限制个人自由的东西都应该被抛弃。这种思想在二战以后五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但那时候还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主张，或者说不自觉的主张。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经常听到里根主义，还有撒切尔主义，它们的核心观念其实就是新自由主义观念。经济上要自行其是，政府不要干预，要给予自由，这使得新自由主义一直持续到今天，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主流价值观。我们说要反对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也很明显，比如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女性反对男女不平等是对的，但发展到女性至上，女性绝对化的时候，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女性研究中的体现。现在很多作品宣扬的就是我愿意、我开心、我高兴，这就带来了现在美国社会、欧洲社会的分裂。而现在很多文学研究还在鼓吹和践行着这样的主张，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刘老师并不是反对或者完全否定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他肯定新自由主义在发挥个人才智，特别是遵守个人权利的方面比任何时期都更为自觉，成就也更为巨大。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给了我们更大

更多的自由，但在新发展中究竟界限在哪儿？我们如何考虑这种界限？这就是挑战所在。

在如何应对挑战方面，刘老师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认为，首先要有问题意识，要迎合大的趋势和挑战去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学科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品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有了问题，研究才有价值。其次，要有应对未来的思路。如果在我们没有那么强大的预测能力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对概念的重新阐释。大家在研究的时候，要对概念进行重新的阐释。很多学生在论文答辩的时候对于论文中出现的核心概念回答不出来。当你没有思路的时候，当你不知道如何创新的时候，其实重新阐释概念就是一个基础创新的很好的办法。第三，是要注意文本细读。刘老师特别强调学术性的阅读与欣赏性阅读不是一回事，学术性阅读是要发现问题，进行细节阅读的训练，在细节中得出结论。他特别列举了《小公务员之死》、《唐·吉珂德》和《哈姆雷特》中的有关细节描写、场景设置与人物刻画例子。

在提问和讨论环节，何成洲教授全面总结了刘老师的精彩演讲，认为本次讲座话题宏大，但是刘老师的讲解深入浅出，同时运用了大量的丰富的文本细节来进行分析，让我们对当前外国文学研究在创新方面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我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有了清晰的认识。随后，与会者还就欧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与批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文化关系漫谈

复旦大学哲学系 王凤才

2020年12月7日，高研院邀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凤才老师做客南京大学高研院名家讲坛，在线给我校师生做主题为“割不断的犹太情结——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文化关系漫谈”的学术讲座。本次活动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戴雪红教授主持，我校及校外的老师同学200多人在线聆听了讲座，并与王教授展开讨论。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它创建于1923年，由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领导成员在20世纪30~40年代初发展起来，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其社会政治观点集中反映在诸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众多社会理论家的著作中。学界对于该学派的主要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卢卡奇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与黑格尔、康德、弗洛伊德和浪漫主义等众多西方哲学思潮的关系已经有很多研究，但是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与犹太文化的渊源与联系这一重要的问题，却鲜有论及。而这正是王教授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

在讲座中，王凤才教授重点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及外围成员弗洛姆、本雅明等，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与犹太教/犹太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中有人讳言自己的犹太身份，但造成这种情况其实与两方面的原因分不开：一是由于历史现实给“犹太人”带来了太多灾难；二是他们试图使批判理论更具普适性，而非民族复仇的意识形态。

接下来，王老师逐一剖析了几位学者的思想与犹太文化的关联。比如，本雅明深受犹太教影响，具有浓厚的犹太精神，他的学术思想与犹太文化融为一体。他终身游离于弥赛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相信弥赛亚救赎可能性，同时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并继承现

代性批判精神，但对弥赛亚文化与历史唯物主义并未倾注全力。本雅明虽与批判理论保持距离，但仍对之产生重要影响，其文化批判、历史哲学等领域的观点对阿多尔诺施以重要影响。

洛文塔尔则经历了“俄狄浦斯情结般”的犹太教转向，虽成长于世俗的家庭氛围，却在大学期间深入接触犹太思想，最终走向犹太教。他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犹太文化兴趣大增，但后期洛文塔尔却愈加悲观并最终放弃复国主义运动。洛文塔尔在思想上对反犹太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进行剖析，同时从哲学和政治两个维度研究犹太哲学与非犹太哲学、犹太思想与非犹太思想的相互关系，相信犹太哲学包含具有强烈世俗倾向的进步理性主义。

而霍克海默则公开承认自己信奉犹太教，且他的批判理论中渗透着犹太文化。在《论宗教》一文中，霍克海默明确指出，“无限的概念”就是源于犹太—基督教信仰的创造性力量。在《理性之蚀》中，尽管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带来种种弊端，但依然对理性蕴藏的拯救潜能抱有希望。他“渴望完整的他者”，但拒绝任何偶像崇拜。霍克海默特别强调哲学的否定性作用，并承认“渴望他者”受到犹太教禁止谈论上帝之名的影响，而《启蒙辩证法》就明确提到这一思想在克服现代启蒙缺陷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弗洛姆是在犹太文化氛围浸染中成长起来的，其博士论文《犹太人的守则：关于散居犹太人的社会学》是有关犹太研究的。此外，弗洛姆积极参加有关犹太活动，如“自由犹太人读书之家”。在他的思想中，可以找到犹太救赎思想的影子。

还有阿多尔诺，他一生极力淡化其犹太身份，他对犹太思想的了解是间接的，主要出于同犹太思想家的交往过程和研究需要。但他骨子里却是“犹太的”：批判文化工业；建立了反体系的否定辩证法，直接影响了他对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态度；受到犹太思想的影响，将否定的辩证法视为否定神学，拒绝描绘肯定的乌托邦；关心和同情犹太人命运，提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论断，呼吁对生存的反思。

最后是马尔库塞，在王老师看来，他是一个没有强烈民族认同感的犹太人，他拒绝作为犹太教徒的犹太身份，只对其血统和文化习俗的犹太人身份加以认同。虽然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本人批判鲍威尔的重要一环，但马尔库塞对犹太人问题不感兴趣，却出于人道主义而非因为民族和宗教关注反犹太主义。他强调建立独立自由的犹太国，但不能陷入民族主义和过渡依赖于美国。犹太文化对马尔库塞的影响并不显著，虽然肯定犹太人反抗的积极意义，但其思想与弥赛亚主义并没有直接关系。

从对这些学者的思想渊源的分析出发，王老师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有些人，如本雅明、洛文塔尔不仅深受犹太文化影响，而且富有犹太思想，甚至可称为犹太思想家，在他们那里，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融合在一起；有些人，如霍克海默、弗洛姆虽算不上犹太思想家，也没有系统的犹太思想，但他们无疑受到犹太文化深刻影响，犹太文化是他们批判理论中不可或缺的要害；有些人，如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基本未受到犹太教影响或受影响不显著，但他们骨子里却是“犹太的”，至少对犹太人表现出应有的同情。总之，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总是有一种“割不断的犹太情结”。

在讲座之后的讨论部分，王老师与现场听众还就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地位、文化批判理论的影响与现实意义、对于人的理解以及艺术哲学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

【学术前沿】

援助非洲和平城市抗击新冠病毒的理念与行动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刘 成

2020年5月25日周一晚19:00,南京大学高研院举行第337期学术前沿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高研院驻院学者刘成老师做有关南京市在此次抗击新冠病毒行动中支持和援助非洲地区和平城市的理念和具体行动的报告。刘成教授是国内知名的英国史专家,也是非常活跃的和平学研究者 and 实践者,他目前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和平学教席主持人,该教席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国际性和平学研究专任岗位。本次讲座也是庆祝南京大学118周年校庆的系列讲座活动,由南京大学社科处和高研院联合举办,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主持了讲座。

“和平城市”(City of Peace)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二战结束以后才真正付诸于现代城市实践,并在最近的十余年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一般说来,和平城市指的是,在特定的城市行政区内,继承城市的和平传统,倡导和平与和解,联合政府、高校、社会团体和城市市民,以和平为城市发展理念,融合历史、记忆、遗迹中的和平元素,通过和平维护、和平缔造、和平构建的途径,实现多维度的和平项目创建,全面提升城市发展并推动国际和平的一种城市形态。刘成教授介绍了“国际和平城市协会”组织的情况,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有包括六大洲59个国家的270座城市加入了该组织,南京于2017年9月9日被定为全球第169座国际和平城市,也是中国首座国际和平城市。

在面对困难时的守望相助是和各个和平城市之间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刘成教授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18日的世界卫生组织开幕式的致辞中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帮助他们筑牢防线是国际抗疫斗争重中之重。我们应该向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物资、技术、人力支持”的号召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从今年3月22日起,包括尼日利亚万巴市、肯尼亚马萨尔市在内的非洲地区的13个和平城市先后向南京发来了求助信,其中特别提到了疫情对于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教育、安全和贫困儿童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国际和平城市和教科文组织和和平学教席所在地的南京迅速行动起来。在3月份刚刚取得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之后,南京迅速向7个非洲国家的13个城市提供物质援助和行动指导。

在国际和平城市协会的帮助下,南京将求助非洲贫困地区的和平城市作为主要帮助对象,有的放矢地开展援助。我们将《中国有关防疫病毒的外文宣传小手册》网络版分享给非洲的所有和平城市。通过“和平学教席的朋友们”开展捐助公益活动,3月27日向非洲13个城市发出第一笔救援资金。南京和平城市援助非洲和平城市的海报发给六大洲58个国家270个城市。我们向非洲和平城市赠送了由洗手液、体温计、清洁温度计用异丙醇、药棉、洗手皂、面罩材料等组成的预防工具包。在喀麦隆的巴门达市,联系了巴门达周围6个流离失所的女户主家庭,捐赠了卫生用具并教会他们的孩子如何正确地使用。在肯尼亚的萨雷市,向社区展示如何洗手,如何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并教会他们制作口罩,此外还发放制作口罩的材料,散发抗病毒宣传单,给每人分发两包玉米粉。

刘成教授认为,这些行动背后的理念既有全人类所普遍承认的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多样性到一致性,从单一到多样再到互动和融合的发展变化的关系模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爱人如己、博爱、立足于人的生存权力、对弱势群体的关爱的尊重”等价值观,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墨家所主张的“兼爱”的思想的核心。这种不同的人类精神财富的融合是的我们对于和平与人性的认知与理解有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的角度、高度和深度,也让我们探索出了一套理解、容忍、接受、珍视和联结的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

刘成教授指出,南京的和平援助行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国际和平城市协会”阿蒙特会长认为,该援助工作“为制止病毒在非洲传播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受到援助的非洲城市的项目负责人也在各自的 Facebook 里发表相关图文报道此事。刘成认为,和平学教席援助非洲和平城市的活动,践行了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符合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向世界传递了南京的和平之声,展示了南大人的担当与情怀。

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在讲座之后的点评中高度赞扬了南京作为和平城市在此次抗击病毒的援助行动中的表现,同时也对刘成老师所怀有的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表示钦佩,他鼓励我们的学生和听众能够从刘成老师的讲座和南京此次援助行动中吸取智慧,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文化和个人能力积极运用到为国家和人类造福的实践中去。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种草带货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胡翼青

2020年6月1日周一下午16:00,南京大学高研院举行第338期学术前沿讲座,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高研院驻院学者胡翼青老师做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种草带货的网络现象分析报告。胡翼青教授是国内传播学者的知名学者,以传播理论和传播学术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他同时也是活跃的思想者和受学生喜爱的老师,曾多次在高研院举办学术活动,并三次担任高研院“驻院本科生项目”的导师。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用户容量为300人的腾讯会议室在讲座开始前15分钟就一度满员。

胡老师的讲座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内容。他首先介绍了话题的缘起,近年来网红经济崛起的现象和MCN机构参与网红的批量化培养的问题引起了他的研究兴趣。胡老师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提出了一个摆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面前的问题,那就是在当下的网红经济时代里还在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的二元视角来看待传播和网络直播现象,这是否意味着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变得过时了?

随后,胡老师围绕传播政治经济学及其路径的问题展开论述。他首先介绍了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亚当斯密等人对于社会公平、市场伦理等问题讨论,而传播社会学则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胡老师认为,传统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于政治与经济的聚焦使得很多重要的思考维度没有被涉及,比如劳动劳工和媒介技术。胡老师专门谈到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于技术的不同观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政治经济学没有注意到技术正在以透明化的方式渗透在人们身边,而学者们却没有对此产生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微观层面的人的劳动、人的全面发展、劳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并没有得到主流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路径也得到了拓展，除了传统范式中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博弈以外，还有如受众商品论、空间政治经济学、技术的政治经济学等开始萌芽。

胡老师认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平台时代，技术反思和制度批判是我们今天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其中的困惑也同样出现在数字劳工和玩工等现象上，网络作为一种技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剥夺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人们已经逐渐失去了劳动与休息、工作和生活、真实与游戏的界限，所有人都被裹挟进资本的运作中。在胡老师看来，我们今天正在面临劳动与娱乐之间的第四种关系的倒置，这是一种彻底的倒置，我们会把帮助别人打工当成是娱乐，当成是游戏，当成是自己在追求自由，这样的话，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便到达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技术的反思则更为重要，因为技术带来了新的时间和空间问题，而时间与空间问题重组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种草带货的话，会有几个问题不容忽视。首先是传统媒介平台的主持人和主播的急剧衰落，他们会在今天普遍陷入一种速度和真实难以两全的境地。这种以算法为基础的网络平台经济天生带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偏向，它让精英主义、奢侈品时尚和中产阶级自我标榜的价值观不得不为其让道或受到其影响。其次，这种平台经济也存在着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权力规训和操控的风险。像MCN这样的平台会不断地制造网红，这会带来潜在的社会和市场权力，而且能量巨大。因此，种草带货背后的整个社会网络结构都是值得持续关注和研究的。第三，种草带货引发的对于消费过程的这种参与本身，涉及到直播间空间结构、观看直播的人和直播的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想象、直播中抢购的热潮和风潮所带来的“管涌”一般的消费形式等一系列与速度和时间有关的政治经济学话题，还有就是这些话题是怎样再一次地拉动了资本复制的话语的。速度不但创造出了时间，还创造出了全新的空间。当种草带货已经延伸到“小镇青年”和“小镇贵妇”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对于社会的拓殖已经到达了一个让人无处可逃的不可阻挡的地步，这时，消费变成了一种劳动，而参与消费的个体则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狂热的消费劳工。由此，胡老师认为，种草带货其实是一个窗口，一种表征，一类景观，让我们在今天的速度、技术、市场和政治权力等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看到了一系列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景象，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媒介哲学问题，仍需要从媒介技术哲学、媒介化社会理论等角度去进一步展开探讨。

在互动环节中胡翼青教授就受众在直播间中的角色、网红是否会变成程序化工业等问题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在最后的点评环节中，周宪教授肯定了大卫·哈维、斯蒂格勒等思想家对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批评传统，也肯定了胡翼青老师从专业角度讨论政治经济学如何介入我们今天的媒介社会的分析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他提到了“注意力经济”的问题在于信息的大量冗余而人的注意力缺乏，这使得人被裹挟到其中，技术在不断地要挟、蚕食、胁迫我们的注意力，而这种胁迫可能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破坏我们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性。在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批判性问题上，周宪教授赞同胡老师的观点，认为速度和效率可以帮助时间越过空间的障碍，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特别需要对这些“新”的东西保持一种认识上的敏锐性和警觉性。

先锋艺术的雅努斯面孔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周计武

2020年6月2日周二晚19:00，高研院举办学术第339期学术前沿讲座，由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高研院驻院学者周计武老师为大家带来题为“先锋艺术的雅努斯面孔”的报告。

本讲座也是南京大学 118 周年校庆系列讲座，由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和高研院联合举办。讲座由南京大学高研院副院长从丛教授主持，一百多位老师和同学在线参与了本次活动。

本次讲座主要围绕二十世纪兴起重要的艺术现象即先锋派艺术展开。先锋派艺术是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之一，泛指最新的具有反叛性的文学艺术现象，但也特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欧洲出现的反对艺术体制和艺术自律的一些艺术流派。在本次讲座中，周计武教授主要从先锋派的得名、理念革新、艺术表达和没落终结四个部分与听众展开了交流。

周老师首先指出，先锋艺术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范畴，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往往具有复杂的、微妙的差异。在法语中，“先锋”本义指军事领域的“前卫，先头部队”，自十九世纪 20 年代以来才逐渐被引入文化艺术领域，以隐喻的方式来表达极端的艺术思想和乌托邦的政治诉求。概括来说，这种隐喻的方式主要有军事的与科学的两种。作为军事隐喻，“孤军深入的”先锋艺术以标新立异、令人震惊的艺术效果，独自向僵化的社会体制和庸俗的布尔乔亚价值观宣战。而作为科学隐喻，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对未知领域的探险精神与冒险态度，引申到文化艺术领域，侧重于审美层面的试验，对审美观念进行批判性重构。由此形成了两种意义上的、承担不同功能与角色的先锋——政治先锋与审美先锋。

在先锋派的形式及观念的革新的问题上，周老师认为，理解这种形式的革新的总体判断源于达达主义者对艺术创作的命名——反艺术（anti-art），即不是艺术的艺术。先锋派的艺术，不再沿着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美的传统进行革新与创造；作为反艺术，它是对美的艺术的彻底批判与重构。先锋派不仅反对艺术品生产、分配、传播与消费的机制，而且批判美的艺术赖以维系的一种自主性/自律性的范式。他引用分析美学家乔治·迪基在《什么是反艺术》中对于反艺术的界定，认为政治先锋派在艺术形式与观念上侧重于对社会的介入和批判，希望以此来建构或重构自身的文化身份。而审美先锋派更倾向于形式上的试验，通过标新立异的方式，在不断的批判否定中形成决裂的传统。他随后列举了约翰·哈特菲尔德的《超人阿道夫吞金吐粪》、乔治·格罗斯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克里斯托夫妇的《铁幕，油漆桶墙》、贾斯帕·约翰斯的《三面旗帜》等一些列先锋艺术作品进行了分析。

周老师认为，在艺术表达上，先锋派艺术追求的不是确定的意义，而是无意义、失落的意义。用本雅明的话说，就是从静观转向震惊——不再让观众凝视、欣赏艺术作品，而是积极地思考何为艺术？何为存在的意义？何为人性化的世界？或者是一种被哈尔·福斯特称为“反美学”、被阿兰·巴迪欧称为“非美学”、被利奥塔称为“崇高”的意义。先锋派艺术暗含了对自康德以来古典美学的不满，这种不满一方面源于艺术本身，另一方面源于对审美乌托邦的揭示与批判。他认为，过去古典艺术的核心范畴就是再现，到了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转向重构一个世界，到了先锋派就遵循着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试图不断解构、不断建构一个世界。

由于先锋派艺术的这种进、反叛、虚无、苦闷的心理特征使先锋艺术运动在二十世纪后半期陷入政治与审美、破坏与创新、前卫与庸俗、时尚与俗套、激进与颓废等一系列充满悖论的尝试之中，而这种正反同体的双重性形象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先锋艺术的“雅努斯面孔”。这种内在动力机制是先锋派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就被视为在艺术史叙事上寿终正寝的重要原因，有人称之为“英雄主义的挽歌”。但是周老师认为，先锋派艺术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先锋精神就是过时的，相反，它是永恒的，先锋派是永不停息的运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锋派，如利奥塔所说，先锋派就是原初的现代性。作为风格的先锋派已经是过去式，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态度、立场、体验，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的先锋，是永恒的。

在讲座结束后的互动环节，周计武教授和主持人从丛教授还就先锋派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技术与当代艺术结合的趋势、先锋艺术与当代艺术非审美化之间的关联等问题与听众展开了交流。

极限与常态：后 2020 的新型人类聚居问题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鲁安东

2020 年 6 月 3 日周三晚 19:00，南京大学高研院学术前沿讲座第 340 期在线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高研院“中-加”城市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鲁安东教授主讲，高研院副院长从丛教授主持，讲座题目为“极限与常态：后 2020 的新型人类聚居问题”。本次讲座也是南京大学 118 周年校庆系列讲座，由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和高研院联合举办。

在本轮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所带来的极限人居的状态中，出现了一种在当代快速流动、密集聚居的常态条件下发生的场所、居住、人、空间等建筑学基本概念发生变化的现象。这一问题引起了鲁老师的注意。他认为，这种现象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传统建筑学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和基础性问题，需要我们在将其视为网络流动、人地交互、生命环境的共生循环的意义上重新定义“场所”，同时还需要我们深入反思新技术是如何改变日常空间的问题，以及在精确面向个体的当代技术人文条件下如何使建筑学与人类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

鲁老师首先对本次新冠疫情的爆发情况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疫情作为一种极限状态，显现了平时隐藏的不可见的问题，具备包含未来常态的可能性。他提出了“如何通过对极限的理论化观察与思考发现未来潜在的常态”的问题，并以此为思考的起点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疫情之初所考虑的一系列有待观察的问题。

疫情中的极限人居状态问题，是鲁老师关注的一个基本而且重要的问题。他认为此次疫情反映了当代全球范围以城市为枢纽的人居环境的特点，快速流动、密集聚居、产业发达等特征固然有其优势，但此次亦暴露其不利的一面，而城市在这一过程中不但成为了流行病跨区域传播的连接站，反过来也是产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地方性前线。鲁老师指出了此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措施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精确作用于空间中的个体，这当然也和此次疾病传播的路径有关。他特别强调“传染”一词的含义，其中既有人和人之间“传”的社会性层面，也有个人被病毒感“染”的生物性层面。在这一意义上，具有空间威胁的公共卫生危机凸显了空间“使用者”这一概念在作为生命体和行为能动者的双重意义。鲁老师认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空间”作为对个体接触进行监控和干预的核心手段，主要通过社交疏离、社区的“网格化”防控和由新科技支持的“无接触化”等关键措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面的塑造和重构。不同于之前的历次危机，本次抗疫活动中的空间应用在技术的支撑下以一种突变的形式完成了对个体需求的升级迭代。

基于上述的观察与分析，鲁老师认为需要在几个方面对当代技术人文条件下的与空间有关的基本概念进行重新定义。首先是“场所”，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场所理论框架来理解此次由疫情所带来的新型人类聚居方式，其中特别需要突出场所的网络流动属性和生命环境属性；其次是“栖居”，疫情期间社会被隔离成彼此独立的居住单元，在这一背景下技术对人会造成那些影响和塑造，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展开分析并据此提出新的空间规则，特别是提出要找出这些以片段的方式呈现的“场所”之间有哪些新的连接关系和新的秩序，在此他特别列举并分析了“增强场所”的概念。再次是“人”，在新型人类聚居条件下，有必要树立人作为行为能动者与环境生命体的新认识。还有就是“空间”，他认为，对空间隔离的建筑表

征已让位于一个更加不可见的技术化的全景式监狱，建筑学在失去对空间隔离进行物质表征的传统领域的同时，反而在提升建成环境抵抗危机的韧性方面则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最后就是“增强人”，鲁老师认为，当代的技术人文条件可以使我们能够前所未有的精确地面向个体，让我们有可能实现从文艺复兴时代的“普遍人”到现代主义的“标准人”再到当下的“增强人”的转变，或许我们又一次站在了人文主义的全新起点。

根据以上思考，鲁老师指出，本次疫情除了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公共生活停摆以及各种医疗、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交织以外，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在高密度条件下的生态共生、“超地方的”和“泛人类的”流动交换、以及技术带来的全新的增强环境的可能性，共同构成了当代新型人类聚居的特征。这种新型人居方式的好坏目前尚未得到彻底的展现，但如果想要克服其潜在的不足之处的话，首先就需要立足于对“人”全面地重新认识。而在精确面向个体的技术人文条件下，建筑学将成为人类知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整合者和能动者。它将日益细分的人类知识体系整合进一个回应个体人的生命环境连续体之中，并通过支持日常实践将对空间的生产和对自然的生产连接起来。鲁老师坚信，对“人”的新认识与对超大尺度的科学化认知有可能找到一个全新的连接点，而这种连接点将是未来人类共同生存的一个必要前提。

在讨论环节中，鲁安东老师回答了听众关于场所的定义、空间关系的模式以及人的流动性与空间的关系等相关问题。主持人从丛教授肯定了鲁老师对极限人居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并认为其中的很多观点都呼应了人文主义研究的传统，体现了丰富的人文关怀。她也对鲁老师的研究方法表示赞赏，对他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敏锐性和责任感表示钦佩。

【跨学科研究】

高研院举办“2020：和平与冲突”国际和平学暑期班

2020年7月20日-24日，由南京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IAS）与英国考文垂大学信任、和平与社会关系中心（CTPSR）联合举办的“2020：和平与冲突”线上暑期班成功举办。



本次暑期班由考文垂大学信任、和平与社会关系中心主任 Michael Hardy 教授和南京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刘成教授联合策划，邀请了 CTPSR 中心的六位老师共同开设了为期 5 天的线上教学课程，内容涉及和平与冲突的含义、如何分析冲突与暴力、人类需求与长期冲突、以及正义、谅解与和解的达成等主题。来自南京大学哲学系、医学院、法学院、信息管理学院、地理学院、文学院、历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新闻学院、生物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大气学院以及中美文化中心的 30 名本科及研究生同学参加了此次暑期班的学习，此外，还有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负责人杨敏女士及南京航空烈士纪念馆办公室主任程薇薇女士等和平学爱好者及从业者参加了旁听。在 7 月 20 日的开幕式中，考文垂大学 CTPSR 中心主任 Michael Hardy 教授、南京大学高研院副院长从丛教授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刘成教授分别代表活动主办方致辞，并预祝活动圆满成功。

本次暑期班的工作语言为英语，在活动流程上主要包括个人准备和线上互动两个环节。在每天开课之前，考文垂大学的老师们会先在该校网页上提供学前阅读资料，暑期班学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进行提前阅读和课前准备，随后再在每天固定的时间里参与线上教学环节，与老师展开互动。在课堂上，我校学员们积极踊跃地进行小组讨论，开展课堂调研，并针对老师的案例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经过五天的教学互动，暑期班的参训同学们对和平学理论、冲突与暴力的本质、正义与和解的方式等问题有了较为系统的认知，对于如何运用冲突分析法去和平地解决遇到的问题，对于理解正义、宽恕与和解的价值和内涵等，有了丰富的收获和自己的思考。



本次暑期班于7月24日顺利闭幕，与会的英方教师对南大同学的表现表示称赞，学员们也踊跃发表自己的学习心得。本次活动是我校目前首次举行线上国际和平学暑期班的尝试，为我们此后举办类似活动积累了经验。本次活动也是高研院继2014年支持举办东北亚区域和平教育机构（NARPI）的和平学暑期班、2016年支持举办荷兰战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所（NIOD）的和平学暑期班等活动以来，又一次成功举办的此类跨学科活动，同时也致力于进一步将两校及两个机构的交流推向深入。英国考文垂大学的信任、和平与社会关系中心（CTPSR）是全世界最大、也是最专业的和平研究机构，考文垂大学也是国际知名的从事和平研究与教学的高校。英国的考文垂市因其在二战中遭受的大轰炸而成为举世闻名的和平与和解之城。